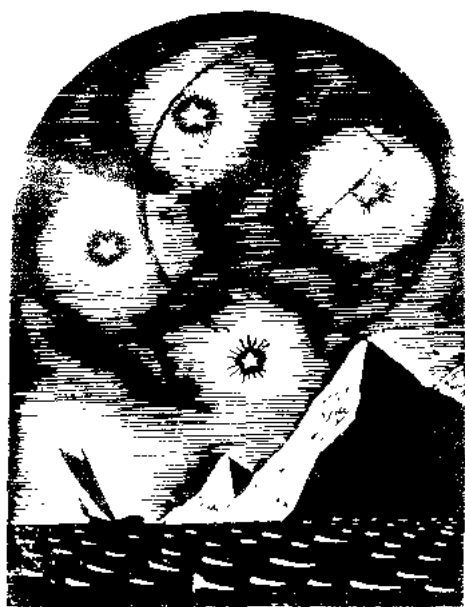


守夜者札记

王康等著

思想者语录

青島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策 划 丁 东

责任编辑 王一方 杨敏青

装帧设计 郝 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守夜者札记/林贤治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1

(野菊二集·思想者杂语)

ISBN 7-5436-1956-3

I. 守… II. 林…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325 号

野菊二集

守夜者札记

林贤治 著

*

青 岛 出 版 社 出 版

(青 岛 市 徐 州 路 77 号)

邮 政 编 码:266071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青 岛 新 华 出 版 照 排 公 司 排 版

胶 州 市 装 潢 印 刷 厂 印 刷

*

1998 年 12 月 第 1 版 1999 年 1 月 第 1 次 印 刷

32 开(850×1168 毫 米) 8.625 印 张 2 插 页 210 千 字

印 数 1-5000

ISBN 7-5436-1956-3/I·321

定 价:13.50 元

自序

自家的经验

年初，丁东君从北京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位在出版社工作的友人，读了我在《黄河》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决意为我出版一个集子，并希望尽快编定，云云。这种好意实在很可感。于是，趁了某夜的空暇，把塞在抽屉里的大小纸片给翻了出来，检出有关知识分子，文化和文学批评的文字，再挑剔一过，终于凑成眼下这样子。

说到批评，我不知道学界的定义如何，也不知道是否需要遵守一定的“原则”或“规范”，只是一直将它看得很简单，以为不过自说自的话而已。因为是批评，所以比较一般的话语形态，必然含有更多的不平和偏见。什么客观公正，纯属欺世之谈。自然，不管话如何说，总须说得具体明白。问题恰恰出在这里：许多已经明白的物事，往往一下笔，就都变得模模糊糊；有时候，甚至连批评对象也逃得无影无踪。正如鲁迅说的“鬼打墙”，读者是看不见的。这种情形，以自家的经验，以为并非全困了学者所称的“逻辑”“学理”或者“技术”之故。到底缘由如何呢？这是无从追问的；倘要深究，怕实在只好陷于失语状态。大约也正是为此，我想，所谓批评也就真的可以成为一门玄奥的学问的罢？

野菊

林贤治·守夜者札记·自序

编辑先生虑及丛书的体例，临末也讲“统一”，要求书稿前面必得冠以一篇序文，于是无话找话，拉杂写下如上这些，算是交代。

林贤治

1998年10月，时已秋深。



林 贤 治 · 守 夜 者 札 记

目 录

[1] 世纪的回眸

[7] 娜拉：出走或归来

- [39] 鲁迅的反抗哲学及其运命
- [84] 守夜者札记
- [137] 一个人的爱与死
- [154] 也谈鲁迅研究之谜
[附] 谢泳：鲁迅研究之谜
- [161] 答《新周刊》记者问
- [163] 答《南方周末》记者问
- [166] 文化遗民陈寅恪
- [171] 两个顾准
- [176] 再说两个顾准
[附] 李慎之：只有一个顾准
[附] 丁东：顾准之谜我见
- [192] 略论秦牧
- [206] 吴有恒：并非空洞的回声
- [214] 诗人筱敏

- [221] 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
- [227] 文人的散聚之类
- [229] 文派与文学
- [231] “巨著意识”辩
- [233] 话说“捐班”派
- [235] 文人下海别谈
- [237] 阅读与反阅读
- [239] 读热烈的书
- [242] 让思想燃烧
- [244] 曾经推介的四种书
- [246] 序《曼陀罗文丛》
- [249] 序《曼陀罗译丛》
- [251] 邵燕祥作《忧郁的力量》序

[254] 李士非作《俄罗斯行吟》序

[259] 苏晨作《往事不如烟》序

[263] 梁以擗作《不寐的鱼》序

[266] 吴迪安作《血洗的青春》序

世纪的回眸

时间的发现与分割,无疑是人类伟大的文化智慧之一。世纪,作为一个长时段,必然穿透个人而接连更多同类,抵达辽阔的界域,承载且激荡着丰富的内容。世纪令人怀想全人类。时间与空间有一种庄严的对称。

此际,我们来到了 20 世纪的人海口。

远溯世纪的源头,便见绝壁重渊,狂流乱注。两次世界大战,漫过短暂的空隙地,蜿蜒至半个世纪;虽然最终为人类意志所遏止,留下的废墟毕竟是巨大的。奥斯威辛至今不长青草。19 世纪,共产主义幽灵犹在西欧徘徊,这时屹立东方,热烈而坚定,恰如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为十月革命犁耕的土地,崛起苏维埃政权,工厂,集体农庄,还有古拉格群岛。战后的冷战季节不算太长。暖风频吹,冰河崩解。30 年代经济大危机过后,几十年间,不复发生如此惊险的故事。“看不见的手”在加紧运作。所谓“晚期资本主义”,仿佛已经穿越有关垂死的预言,平稳进入卡恩所称的“大过渡”。历史深不可测。及至 80 年代末,苏联东欧遽然发生戏剧性演变,致使煊赫一时的演员,在柏林墙的坍塌声中纷纷谢幕。所有这一切,其实仍然不能称作“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国拒下半旗。社会主义以其固有的力量,而使一个传统深厚的民族,在现代化变革的

进程中,保持独有的姿态。

科学文化的发展,与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的联系方式、生活方式、斗争方式等等,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直接。与此同时,科学也以其内在的动力,反过来给予社会以影响,甚至充当变革的先导。作为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早期的科学文化的产物,现代医学,无线电,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汽油发动机,相对论,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形式,对社会的影响是至深且巨的。20年代量子力学的产生,尤其突出地显示了科学的现代性。50至60年代,核子物理和原子能的应用,60至70年代的自动化和控制论,70至90年代,计算机、微电子技术、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推广,所形成的冲击力更是前所未有的了。总之,愈到了后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便愈加迅猛;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同样发生了许多富有时代特点的变化。各种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不断出现;裂变、渗透、整合同步进行,互补性原理成了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架。整个当代科学,处于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趋向之中。习惯性思维,正统的观念意识,现成的定律及范式之类,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挑战;绝对权威不复存在。封闭是愚蠢的。个体性、差异性、偶然性不容忽视。一切趋向熵,没有万古长存的事物,因此变革不能停顿。打破现存的秩序,无序便是有序。统一并非操纵,它仅只意味着事物间的某种关联。既有控制,必有反控制,如此才构成了“系统”……普利高津在描述最近20多年来自然观发生整体的断裂时,指出:这种断裂绝不可能是某一单独领域造成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现象,产生时带有爆裂声,并且可以扩展。爆裂的声音虽或遥远,微末,隐约可闻;然而它是切实的,所以能够鼓舞心灵,使我们感知未来的震荡。

著名音乐家梅纽因说:“如果让我总结20世纪,我要说,它升扬了人本所及的最大希望,也摧毁了所有的理想与幻想。”自从罗马俱乐部的报告问世以后,人口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环境保

护及生态平衡问题,还有海洋及空间问题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未来学界,各种极端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的论调都出来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已被告知:科学本身潜在着使徒和魔鬼两种力量,而且一直处于冲突之中。当科学技术走向成熟,或者说,当它从掌握自然力量进而掌握社会生活时,文明危机便随之发生了。

所谓文明危机,其实是意义危机,价值危机。因此,如何从事文化主体的精神品格的建设,是横亘在我们与时代之间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科学文化的发掘者和播种者,是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创造者和改造者;但同时,又是社会危机和历史责任的承担者。

知识分子是近代现象。严格说来,他们主要的活动舞台还是在20世纪。古代的人文学者为贵族和教会写作,自然科学家为雇主工作,直至15世纪,科学和艺术仍然沦为神学的婢女,我们很难从中窥见人文精神的闪烁的微光。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情况渐渐有了改变。经验科学正步入人信仰的地盘,驱赶其间的迷雾,理性之光使认识升华;虽然后来有着对“非理性”的阐扬,而其实,那是对无视人类更广大的精神领域的专断与僭妄的理性的抗议罢了,结果维护了人性的健全。自近代以降,科学文化不断获取“新工具”,最重要的,莫过于找到了灵魂。知识分子以其独立的创造性劳动服务于人类,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表达了对社会的关怀。像韦伯,曾经悲观地认为,知识分子的个人伦理品质与知识追求无关,而事实上,就像哲学流于空谈一样,科学技术也有着远离人类的自然生活,漠视社会不公的现象,但是由于科学的整体性,精神的广延性,由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省能力的增长,人文思想的血脉非但不会中断,二战以后,特别在今天,对于人类、人的本质、人的命运以及未来的关切,几乎成为科学知识界压倒一切的主题。

知识者的不见硝烟的斗争是十分感人的。当社会危机到来的严峻时刻，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抛弃宁静的书斋、研究所和实验室——长期视作理想的事物——而选择了囚禁、流放和死亡；这些人不计利钝，唯只服从于集体的目标。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在更多时候，知识分子仍然立足于自己的知识专业，以思想、学说、著作，介入社会生活和时代变革。作为人类的文化良心，基本价值准则的看门人，知识分子必须从真正的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追踪一切，思索一切，检验一切，因此他的工作必然具有一种超越本性，其实也就是对现实文化的批判本性。这种批判，是总体性的，直接针对“存在之根”的。知识分子在西方被称为“批判者”、“反叛者”；许多学者都给自己的学说冠以“批判”的名称，如康德的“批判哲学”，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等，都说明了批判早已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就说近年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去中心，拆结构，也都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在同记者谈话时这样谈到知识分子角色：

知识分子的工作并不是塑造别人的政治意志，教导别人做什么，而是通过在自身领域所作的分析研究，对那些明显的公设再次提出质疑。动摇传统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打破常规，重新衡量机构的组成法则，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特殊工作。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种思索来参与政治意志的塑造，从而尽到公民的责任。

知识分子角色，并非来自权力的分配，而是由个人赋予的。实际上，他们对社会以及各种学说的批判，往往不是通过学科、学派、数字和结论的比较，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念，在一种乌托邦理想的驱动下进行的。因此，他们来到世界上，便注定要做“孤独的旅客”，即便因为必要而加入某种群体或运动，也将是弱势集团的代

言人。二战以来,随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剧增,知识分子的队伍确乎在不断扩大,然而说到底,仍然是一支孤军。

20世纪是一个苦难的世纪,恐怖的世纪,死亡的世纪;当我们能够从战争的废墟,从法西斯主义和多种极权主义的阴影下走了出来,较为从容地讨论人类的自由和进步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能不归功于活跃在本世纪内的几代知识分子,而对他们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和工作,满怀感激之情。正是他们,从19世纪的前辈那里,接过批判的武器,而更富于英雄主义气魄,冲破重重围困,解放了一大片禁区。当我们随同他们走向一个又一个“诺曼底”,向着耀眼的阳光挥舞胜利的旗帜时,他们又远离我们,继续着他们的英勇无畏的探索去了。

在本质意义上,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和解放者。

今天,我们着手编辑《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本意在各部门科学和艺术中间,尽可能提供优秀的文本,通过个人选集的组合方式,显示接连几代知识分子的基本风貌,勾勒出本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大致轮廓。这是初步的素描,尚谈不上严整的巨幅壁画。

前人有“万有文库”,万物皆备于我,可谓懿欤盛哉;以我们的能力和条件,大抵只好如此了。自然,不求完备也未尝不可以算是一种选择。世界近代思潮的译介,已经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了,可是,多少经典性作家,至今没有他们的译本,甚至连名字也鲜为人知。对于一个文化大国来说,这是很不相称的。庞德说,伟大的文学世纪必然是翻译世纪。广而言之,文化也一样。有鉴于此,当我们做着世纪性的文化总结时,就决意把国内的部分割让出去了。剩下的工作,也就是手头要做的工作,用鲁迅的话来说,还是叫“盗天火”罢。

作为这样一套大型丛书,本当不限于文化积累的;最根本的目的,仍在于现代文化的重建。当此全球信息一体化的时代,民族文

化的发展,必然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我们唯有吸取异质性的思想观念、文化知识、人文素养,才能从一个先天的传统的体系内部,创造出有利于保存、发展,和完善我们自己的良好的生态环境。

上海远东出版社承诺出版《文库》,使我们深怀一种温暖,遥遥缅想那里的创榛辟莽、筚路蓝缕的一代翻译界先驱。在中国现代化的启蒙时期,他们为江南制造局馆翻译馆——全国的译书中心——所凝聚,口述笔译,中外参证,推敲译名,另铸新词,掀起了西学东渐史的第一页。

站在世纪的人海处,回眸世界风景,一如托夫勒所述:“那股咆哮不已的变化的激流,它的能量在今天是如此巨大,以致能够一举冲破约定俗成的惯例,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震撼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根基……”许多伴随工业时代和近代科学兴起的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竞争的种种学说,譬如洛克,譬如密尔,都已经被算作“古典”而被时代的潮流推到后面去了。忆及我国翻译界一段长长的停滞的岁月,真叫人要起“今夕是何年”的感慨!

有一部日本思想家撰写的著作《20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于1901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出版后,即遭政府当局查禁。1927年,曹聚仁先生将它重新标点出版,赞叹道:“在25年前,中国学术界已有人来译述这一类读物,真可使我们现在人十分惭愧。”比起时代要求于我们的,我们着实做得太慢了,太少了,应当愧对前人的。

在又一个世纪的钟声即将鸣响的前夕,还能说些什么呢?既然历史已经延误了我们,就不能再因我们而延误了历史!

(本文为大型丛书《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的主编序言,该丛书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娜拉：出走或归来

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

——易卜生：《傀儡家庭》

1

20 世纪曙色大作。

中国。北京。在黑暗的最深处，先觉者呼唤、叫喊、挣扎、与旧物相纠缠。青年运动快刀般切入历史，旋即为党派力量所左右；自此，劳工大众代替了知识者，精神为物质所置换，组织淹没个体，地面的革命战胜了书面的启蒙……

西方的各种思潮，同时通过新文化运动的窄门进入中国；有的化做云烟，有的变作沙泥，其余的成分则结合了传统的力量，衍生为主流政治及其意识形态。

政治来源于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由于文化是多元的，政治是一元的，结果为后者所不容。

政治有弑父情结。

在极权主义时代，“无为而治”成了一种政治理想。从本质上说，权力是专制的，强暴的；倘要治者“无为”，除非因自身衰败面沦为弱势集团，否则不会放松控制。

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明显地同弱势政府的存在有关。

然而，传统是强大的。

几千年是一个恒量，它所指称的实际上不是时间，而是空间，是人类生命原子在当下承受到的巨大压力。

传统是别无选择的。于是，反传统成了唯一的选择。

五四运动是一次集体出走事件。

知识者不甘于做黑暗的附庸和牺牲，也不甘于目睹周围的昏睡。这是理想主义者的一群，知识——父辈称作“西学”——赋予他们以自由的信仰、理性，叛逆的勇气和热情。他们必须起来、走开，远离了奴隶生活，那充满血腥和朽腐气味的“铁屋子”。

在古老的语码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个觉醒时代的对应物。闪电并非来自云层。那是普罗米修斯之火，是盗来的光焰，娜拉超越了伦理的意义而成为中国现代的象征。

2

时代的情感内容不容漠视。

关于历史、社会、制度，学者可以拿出事先制做好的各种工具去计量、划分、考证，用逻辑的语言作出各种判断，唯独可以不必理会人类的情愫。情绪是一种充盈的液体，它比僵硬的教条，周密的计划，蒙了面具的戏剧更真实，更富于变化，古人采风，就是采情绪。但当民怨沸腾，便可以感知社会的崩溃；此时，有关政治安定的结论，无论如何的言之凿凿，都不足为据。

集体情绪比集体意识更敏锐地预告着时代的到来。

五四的典型情绪：怀疑与愤怒。

据此，我们说五四时代是革命的时代。

与其说，激进主义是一种信念、一种立场、一种思想—实践方式，毋宁说是一种特定的情感形式。

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激进主义既可以成为左翼，也可以成为右翼，其表现内容或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新文化运动被称为激进主义，其实并非诬枉：只是它既不同于此前的英国激进派和法国激进党，也不同于此后的德国法西斯，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尚未超出文化的范畴，是精神上的反叛行动。这批文化革命的先驱，力图颠覆个人——民族的奴隶地位，所以不可能不是激进的。

易卜生被斯特林堡称为“欧洲的最愤怒的人”。他在戏剧《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宣说一种哲学：“全有或全无”；恰如另一位怀疑论者克尔凯郭尔的命题：“非此即彼”。倘要“整体革命”，便要激进主义。

真正革命的行动主义者，决不会平和地讲说“客观”和“克制”，除非场外的学者。在一个奴役的国度里，即使人道主义，也会被目为“过激”的。场外与场内不同。场内总是倾斜的，旋转的，满布飞扬的沙粒。

激进主义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相对的。譬如，相对于陈独秀，相对于鲁迅，胡适可以说是保守主义者或温和主义者了罢？然而，他的那些提倡“白话”的文字，在林琴南们看来便激进得可以；又如鼓吹“人权”的文字，在政府那里，其激进则已到了必须制裁的地步。正因为语意模糊，学者便常常借批评“激进主义”，而唾弃五四的内核。

胡适在推进新文化运动时，可谓“去志已决”；但在检讨自己的历史时，仍然不无惭愧地说，自己的态度太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态度做去，而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探讨与尝试。

有学者批判五四的激进主义，耸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